

学会批判思维 学会战略思考

哲学演讲季大半已过,在从马哲、西哲转入中哲之际,记者采访了几位核心岗位的负责人,在周末的精神家园内,他们是哲学季的普通听众,而哲学季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已经辐射在他们的岗位上。

用批判思维来反思现状走向未来

章博华(1937年生,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曾在国防科委工作,原上海市妇联主席,市人大常委会驻会常委,2003年退休,从事慈善。听了四场)

我很早就关注文汇讲堂,杨福家、赵启正的演讲我都来听过。这次哲学季,我从王德峰开始每期都听了,感觉很幸福。因为我是个工科生,曾经学过哲学,但今天听来,有许多亮点,一些知识我不能马上消化,所以,每次报纸版面报道出来后,我还会再回炉思考,总体有补课的概念。

我在第一女中求学,接受了独立自由民主博爱的思想,青年时,我们是“被塑造的一代”,是“幸福工具”。听了哲学季,最大的感受是批判思维的接受。它帮助我从目前存在的问题,从本质上从结构上反思。反思我们的过去,我感觉社会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超越。哲学季让我们带着今天的反思,走向未来,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所以,思想的解放是根本的解放,人如果不能像野马一样奔腾,就很难有创新。

哲学季牵动了我的平时思考的很多问题和人生感悟,社会上的确很不少人失去了理想信念,如果学术精英们能帮助领导干部们率先垂范,帮助民众正确理解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现象,这就是哲学季的意义所在。

工作遇挫时需要理想支撑

李崑(黄浦区常委、宣传部部长,听了三场,1970后)

哲学季做得很好。七位教授连续登台,具有集聚效应。同时也欣喜地看到,这些教授这几年在学术上

又有很大的提高,不仅在原有的哲学系统研究上做得比较好,在应用研究上,上海学者领先了一步。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童世骏教授的《凡俗生活和理想境界》。它给我的启发是,人需要哲学思维,理解当下不太合理的现状,有些事情在管理、技术上无法解决,但是如果意识到童教授所说的人的本质是求真求善向美的,那么,我们的宣传工作就是要如何去影响和激发他们的这种潜能,可能暂时没有效果。这种人的本质为我们做宣传工作从本源上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而陈学明教授和儿子的一段对话,从若干年后人们回看对物质的追求,会觉得是一种“傻”,也给人很多启发。

听了哲学季后,往往想问题会从以往的一点、两点发散到三点四点,比如会想到五年后对形势的引领作用;同时,虽然不能渴求所有人都有信仰,但对我们这些核心岗位的人来说,信仰理想的确很重要,一旦具备了,我们做民生、做文化活动,遇到困难也会支撑下去;同时,哲学季的确有精神和心灵的净化作用,对反腐倡廉也有帮助。

对思想和灵魂的触动

许复新(金山区副区长,听了四场,1960后)

我觉得哲学季所选的教授水平都不错,每场演讲既有学术内涵,又和现实问题紧密结合,看到哲学教授在很纯粹地关注社会发展,感到很欣慰;同时哲学季组织得也不错,有视听的嘉宾介绍,有现场惊喜环节的艺术结合。

对我个人而言,思想和灵魂触动都不小,许多问题尝试着从哲学角度、系统角度、全面角度去解读,尤其是反复提到的批判思维,现在社会比较浮躁,一些传统的理念、方法确实需要反思。

“能力”提高无法取代

潘枝青(闸北区宣传部副部长,听了五场,1960

后)

哲学季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总书记号召大家学点哲学,学点辩证法,去北大还特地看望哲学家。哲学季云集了上海顶尖的哲学教授,的确是沪上的文化盛事。其次,活动有现场演讲、音频上线、版面刊登,现场又有提问和点评,还有微信提问电话回答等,形式多样,也很便捷,每场设计的惊喜,降低了理论的枯燥,帮助大家解读。希望以后能出书。我每次会把哲学季登报后的内容摘选一些实例和理论结合的部分做成中心组学习的快报。

我有个体会,我们搞群众路线,作风固然要抓,但不能代替能力的提高,领导要具有好的导向、勇气,工作的坚韧性,还需要有智慧。这些都是哲学季给予的启迪。

很好的“借脑”平台

郁振华(华东师大哲学系系主任,听了两场,1965后)

今年春夏之际的“哲学季”非常好。公共演讲既要立足专业又要有公共话题,对学者来说,也是很好的梳理,其中的话语转换是很大的挑战,而哲学本身就是需要处理公共问题,关怀就是比较大的。与民众面对面,有现场提问和微信提问,是搜集问题的好平台,那种无法预料的问题,往往是给自己带入了别人的人生经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借脑”机会。

采访/整理 李念

“精神家园”中我们还很年轻

2014年5月8日14时,有16位听众应邀参加了讲堂筹办的“年长者新媒体学习会”。文汇讲堂特意为大家申请了一个多媒体教室。在学习会上,讲堂的工作人员耐心地演示如何使用“喜马拉雅微电台”,学员们也体验了远程教育的乐趣。

在学习会上,优秀学员王士田表达了“文汇讲堂”实现了他的大学梦的感激之情;肖建明老师讲述了“文汇讲堂是我师”的故事,两位还获赠文汇讲堂精编集。最后各位学员决定建立以王士田和肖建明为核心的学习小组,并拟定在5月18日后进行第一次讨论。



“年长者新媒体学习会”结束后,16名听众与文汇讲堂工作人员合影

讲堂相约“互联网金融创新”

5月15日周四下午,作为媒体特别支持单位,文汇讲堂携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成立30周年“EMBA名师管理论坛”推出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创新与企业创新》主题论坛,通过微信、数据库报名公开征集了二百多名听众参与。

在金茂君悦,主讲者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朱岩做了主题演讲,有谢国忠等人参加的对话也精彩纷呈。

作为深度互动的学习平台,文汇讲堂将继续向听友们推荐有价值的优质讲座,组团出席。

撰稿 王政 林吉霞

(上接第2版)一阵笑声,打消了高瑞泉的紧张。“下次你来时,先打个电话吧。”老先生又拿出一本自费出版的《人心与人生》,题上“高瑞泉同志赐教”,落款、钤上名章,送给高瑞泉;“这可以代表了现在的我。”第一次见面虽然没有谈及梁先生的哲学,但一个哲人率真坦荡的气象已经感人至深。

就这样,在梁家客厅里,91岁的名儒与36岁的研究生断断续续探讨着“意欲”、“直觉”、“理性”概念,以及泰州学派、禅宗等诸多问题。“虽然每次谈的时间不长,但是受益匪浅。现在回想,我只是对唯意志论感兴趣,从哲学的自洽与圆融来要求,以为梁先生的哲学不够精细。现在回望,论文题目和我的视野都有点偏窄,对他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并不深,对他作为现代新儒家先导的历史地位,也是后来才慢慢确认的。”许多人为他没有录音而表示遗憾,高瑞泉笑着说,八次造访中,其实连合影也没有留一个。不过,梁先生作为一个反潮流哲学家的勇气和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的操守,面对后生,既不跋扈又不故作俯就之态的平实从容,所有这些,经过当面就教所留下的印象,比照片更重要。高瑞泉说,“我不主张圣人崇拜,现实世界没有圣人,如果真的要讲圣人的话,梁漱溟先生算是一个。”

墨子刻:他要我真正的“吵架”

1994年,墨子刻走入他学术交流的视野。

墨子刻,是著名的中国学专家 Thomas A. Metzger 的中文名字,费正清的高足,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资深研究员,有时会幽默地自称“没资格”。这位现在年过八十的犹太裔学者热爱和尊重中国历史和文化,跟中国学者一样关注“中国往何处去”,为

此,上个世纪至今,他和导师费正清、汉学大师史华慈、狄百瑞论学,后又和杜维明、金耀基、李泽厚、金观涛、李强、萧功秦、张灏等华语学者交流。而高瑞泉恐怕是大陆学者中与之最早建立学术联系的朋友了。

那一年春天,高瑞泉在香港中文大学短暂访学,在一次学术报告以后,一位蓝眼睛的外国人首先发问,手举得很高很高,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高瑞泉演讲的主题是他后来发展为一部著作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墨子刻的提问很有挑战性,事实上,就基本文化倾向而言,他和高瑞泉之间有很大的反差,因为他毫不讳言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美国人的视角。不过他更强调“沟通”,强调通过互相批评来获得相互之间的理解。

从香港初次见面以后,高瑞泉数度邀请墨子刻来沪访学;期间也曾受墨子刻之邀请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合作研究。这来来往往的学术交流,既包含了互相理解,也包含了争执。墨子刻虽然说着不紧不慢的汉语,但个性却异常直率,像西方许多学者一样,墨子刻习惯于在与同行持续的争论中展开自己的理论,甚至通过批评同行、回应批评的过程来形成自己的著述。所以他常常会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我们真的吵架,好不好?”

他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当代年轻中国学人如胡伟希、杨国荣、郁振华、许纪霖、高力克、郭齐勇、刘桂生、胡军、刘笑敢、汪晖等的著作,并且撰写评论文章。这在西方学者那里是很罕见的,而他批评的态度显示他极为独立的个性。在与高瑞泉的争论中,关于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占了很大比例。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新书《The Ivory Tower and the Marble Citadel: Essay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Our

Modern Era of Interacting Cultures》的导论中,墨子刻用近80页的篇幅,评论高瑞泉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墨子刻认为受冯契先生的启发,高瑞泉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作了新马克思主义式的诠释。揭示了“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实际上是由诸多思潮互相影响而形成的现代性共识。这个主题经过当代中国学者的的发展,已经展示出多元的充满活力的思想传统。高瑞泉的观点对组成这个传统的争论作出了贡献,对于墨子刻所持有的新黑格尔主义和韦伯式的政治哲学,又实际上构成了“理性主义”的反驳。

“我欠老墨一笔帐,不但是他给我持续的刺激和启发,他的特立独行让我们自叹不如,而且我需要认真地给他的书以一个反批评,我的功课没有做完”。高瑞泉对记者说。

观念史:发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011年秋天,看着厚厚的《平等观念史论略》书稿,高瑞泉舒了一口气,长达一年多的工作就要画个逗号了。对平等观念的研究,固然是既往工作的继续,但也是现实的触发。199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出增补本的时候,添了一个副题,叫“中国现代性的观念谱系”,在那里高瑞泉讨论一系列价值观念,认为它们以社会共识的形式共同构成了现代传统。但是,在讨论平等问题时,高瑞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现实是:中国人以平等为旗帜奋斗了一百年,却在平等的问题上走出大弯路。从文革那样的极端平均主义,到今天贫富的高度分化,从官本位的强大到平等参与意识的薄弱,都显示出我们尚在实现平等价值的途中。于是,高瑞泉将平等单列为观念史的一

种,研究古代消极平等的观念,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转变为积极平等的观念,以及这种转变本身蕴含的诸种紧张。

作为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平等观念史的研究在结项的时获得了优秀等级。但是高瑞泉却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在高瑞泉看来,观念史实际上要研究当代人的“心灵史”,不同于一般的概念分析,观念史同时也关注人的情感、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今天的许多观念,包括那些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念,常常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结果。“创造”已经包含了非连续性。不了解传统是如何转化的,不了解核心观念的历史,事实上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些观念本身。认识我们的观念世界,才能真正认识我们自己。而认识自己本身就是哲学的任务之一。

在观念史研究的实践中,高瑞泉渐渐取得了理论和方法的自觉。再回去读冯契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发现冯先生说由于近代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不能再沿用研究古代哲学的方法,而主要是研究哲学家们“提出了什么新观念,反对旧观念”。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某种意义上就是观念世界的新陈代谢。

从这个意义上,高瑞泉在自觉地延续和发扬着冯契先生的学术轨迹和为学风格,用高瑞泉自己的话说,“哲学家不能只将明灯高举过头,却让阴影留在自己的脚下,现实的关怀和体认可以引向哲学的诗情。”

文汇报记者 李念

采访于2014年4月23日 写于5月2日

5月13日得到高瑞泉确认